

编者按:《辛亥革命》由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1856—1963)著,1912年3月在美国出版。布朗是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他在1901—1902年、1909年两次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和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他写下了17本日记。他与中国的许多政要,包括袁世凯关系密切。作为革命派与保守派之外的第三方叙述者,他的见证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让国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成为可能。

从巡抚到总统 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袁世凯



一个雄心勃勃的巡抚

我与袁世凯初次相识是在1901年夏的山东省会—济南府,在递上我的名片和介绍信之后,他很快与我约定了会面时间。我准时到他的府邸拜会,他不但亲自在衙门口迎接我,还把我请进了他的书房,这真是真心实意的以礼相待。

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袁世凯42岁,中等个头,身体壮实,脸庞刚毅,眼神明亮而率直,气度非凡,我想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引人侧目。

袁世凯的态度相当真诚,通过他那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两年的翻译,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我颇为诧异的是,不谙英文、从未离开过亚洲的他竟然对美国的情况是那么熟悉。他向我谈起了他准备出版日报、设立一所军事院校与一所文科院校的计划。他将给山东省下辖的108个县分配名额,每个县必须至少选派两名学生进入他即将开设的军事院校和文科院校,他要锻炼这些学生的智力和体格,使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把在新学堂里获得的“启发与学识”带回自己的老家,再以这些毕业生为骨干,向每个县普及现代知识。他雄心勃勃地希望以一己之力教化其治下的3800万民众。

他甚至设想了新学堂的外语教学问题,他认为英语、法语、德语的课程都不可缺少,考虑到在山东沿海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德国居民,德语应该成为山东学堂最重视的实用外语。

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为都城北京,以及进军北京的两座门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他的辖区内,直隶总督还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师的道路,负责保卫皇室安全。可以说,直隶总督是清朝的第一总督。

此后,袁世凯以一位直率可靠的臣子形象出现在慈禧太后面前,给善于从细节处观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深刻印象。慈禧太后随后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凯获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职—督办中国北部铁路修建的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侍郎、陆军大臣,最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些经历使得袁世凯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在中国鲜有匹敌者。

“朕命将其斩立决”

袁世凯清楚认识到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士兵

扔掉弓箭,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给士兵们配备步枪,接受前所未有的纪律训练,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他还为他的部队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采取最为标准的卫生措施。

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

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由于袁世凯一直在官僚系统中是以革新者著称,于是光绪皇帝便秘密召见了他,并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的改革政策。皇帝当时认为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荣禄是维新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先授予了袁世凯一个高级军职,命令他马上前往天津,率领军队去治荣禄的死罪,然后让他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囚禁慈禧太后。

袁世凯毕恭毕敬接受了皇帝的密旨,火速前往天津,但是与荣禄私交甚笃的袁世凯并没有砍掉荣禄的脑袋,而是向对方坦陈了一切,给了荣禄翻盘的机会。荣禄乘坐专列火速入京,面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光绪皇帝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显现出自己特有的行事风格:她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命令亲信部队取代了皇帝的卫队。

而第二天一早,她便逮捕了皇帝,将其关到瀛台,直至他1908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夜,光绪皇帝痛苦地写下这样一道密旨:“朕被囚十年,受尽煎熬,袁世凯须负全责——待时机成熟,朕命将其斩立决。”

病势沉重的“足疾”

1908年的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很多人怀疑皇帝去世不是因为自然原因。慈禧太后身边有很多死忠,无助的皇帝却不喜欢他们。假如太后死了,皇帝活着,他必将向这些侮辱过他的官员复仇,这些官员的日子甚至会丢了性命。

不过,光绪皇帝的身体一直虚弱,年仅37岁去世倒也正常,只不过他死得太巧,仅仅在慈禧去世前一天死去,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种种联想。但表示怀疑的人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宫闱秘闻在中国属于最高机密。

皇位的继承者溥仪,是慈禧临终前孤注一掷的赌博。这个孩子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而光绪的妻子成为了皇太后,醇亲王自己则担任了摄政王,载沣一时位高权重,毕竟是皇帝的亲生父亲,他做起事来少了很多顾虑。

此时的中国公众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宦生涯行将告终,因为只要哀伤中的摄政王和皇太后胆量够大,肯定会将他斩首(毕竟是有光绪的遗诏——斩立决),但他们没有作出如此冲动的决定,因为袁世凯的势力实在太大,而且有多个欧洲国家的公使向清廷发出暗示,如果将袁世凯斩首,将“非常不利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国家的安定,摄政王载沣被迫作出妥协,将袁世凯撤职了事。

载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宣称袁世凯这位重要的官员为了国家积劳成疾,一直受到日益严重的腿部关节炎的困扰,出于常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朝廷让他卸下繁重的国务负担,安心养好他那病势沉重的“足疾”。

于是,身体健康的袁世凯,回到了顺德府附近的私宅,安静地过起了平民的生活。袁世凯被免职回家发生在1908年。而1909年我到北京后,与袁家熟识的牧师马丁博士告诉我,袁世凯和他儿子都认为,只要摄政王载沣和皇太后掌权,他都不可能官复原职,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让两人退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对于官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而言,这是一场让其地位一落千丈的突然变故,他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沦落为普通士绅,高傲的袁世凯步入生命中的低谷,在其功业和威望达到巅峰之际,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时局反转,重新掌握权力

袁世凯的继任者是曾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见多识广的端方。

端方是一个怀有开明思想的满人,很多人曾寄望于他的领导。然而他却在1909年10月辞职,这让很多人对大清王朝的未来越发感到担忧。端方辞职的表面原因,是他允许下属去拍摄慈禧出殡的全过程,并在慈禧陵墓附近的大树上架起了电线。

实际上,他辞职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宫内,皇帝的家眷与太监串通一气排斥异己?

大清王朝此时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去世。他去世的那一天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黯淡的一日。

此时,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帝国民众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民心思变,而接受了西方知识却只是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容易被鼓动且不善服从。中央政府因此而显得愈加羸弱,革命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

立宪运动随即汹涌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拥有21名成员的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成立。随后,很多省会城市建立起了雄伟的建筑,用作将来议会的办公地点,有一些则建在旧时科举考试考棚的废墟上。

然而,这些议员的素质千差万别。有些议员的行为根本毫无价值。不过也有议员表示他们会严肃对待这份工作,个别议员甚至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对国家事务大胆建言,自由主动地为中央政府提供建议。中央政府对这样的建议虽然表示欢迎,但却不给予重视。地方政府的领袖们很愤怒,因为他们的意见不获中央政府重视,清朝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因此日益加深。

清朝政府最初的计划是在1915年召集国会。立宪派希望能将时间提前。由于立宪派态度坚决,政府最终被迫妥协,颁布法令将立宪改革时间提前至1913年。

1911年5月8日,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废除由五名军机大臣组成的军机处,成立由庆亲王奕劻和十个行政部门首脑组成的立宪内阁。奕劻在这个夏天颁发了一项因“迟到”而传为笑柄的改革政策,这项政策的确“来得太迟”,因为腐朽的满族勋贵小圈子所实施的政策已没有人再相信。

革命时机已然成熟,一系列的起义事件此起彼伏。可怕的征兆接踵而至,惶惶不安的摄政王发布公告,可怜兮兮地承诺他将答应实施所有能平息民愤的条件。

然而辛亥革命最终在10月10日爆发。1911年10月下旬,惶惶不安的载沣拥立五岁的小皇帝登基,并不顾脸面地发布罪己诏,表示帝国目前面临的困境“都是他自己的错”。

1911年11月6日,载沣迫于局势辞职。其三年的摄政统治以炫耀和显赫开始,以屈辱和毁灭结束。其实朝廷遭遇的困境并非完全他的过错。他只是恰好在长期酝酿的革命风暴爆发时掌权,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成功消弭这场风暴。

仓促间,清政府重新赋予了袁世凯最高权力。袁世凯再次回到北京,成为北方的实际领导。仅仅3个月后,三条内容相似的诏令宣告清朝皇帝退位,逊帝无条件地接受袁世凯提出的所有要求。

清朝政权崩溃如此之快,表明满族统治的基础彻底腐朽,中国人民正为自身的尊严和秩序而斗争。在此如此辽阔的国家,革命进行得如此之快、如此和平,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武昌首义的3个月内,18个省中有15个进行了革命。起义胜利的浪潮席卷整个长江流域。傲慢的大清皇帝以天子之名统治了将近300年的“天朝上国”迅速灭亡,而袁世凯这个曾被满族人罢官的汉人,却利用突然反转的时局,重新掌握了最高权力,甚至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本文摘编自《辛亥革命》,有删节。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